

## 从《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看唐代山东的对外交往

朱 亚 非

日本著名高僧圆仁（794——864）所著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简称“入唐记”）是他在我国活动的亲历记，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与《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游记》并称“东方三大旅行记”，后人将其译成英、法、德、日等多种文字出版，在世界文化史上享有盛誉。

隋唐时期，正是佛教自印度向中、日广泛传播之际，做为日本天台宗高僧的圆仁，为请求唐朝高僧释解天台教义，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随以藤原常嗣为首的日本遣唐使团，历尽险阻西渡入唐，先后在扬州、登州、五台山、长安等地向中国高僧学经请益，学习法华显教和真言密教，历经九年零七个月，于唐宣宗大中元年（847）返国。《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他在我国境内活动的亲身经历之记载。全书八万言，共分四卷，真实地记录了圆仁大师自开成三年（838）六月起至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十二月止长达九年七个月在中国的活动经历。该书对唐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及对外关系诸方面及各种人物的活动、风俗节日等都做了一定的记载，所记内容详尽，文笔生动，被称为是一部波澜壮阔、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具有广泛的史料价值和非常深远的历史影响。

《入唐记》所记载的范围包括今江苏、山东、河南、河北、

山西、陕西七省，涉及九十余州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圆仁两次在山东境内活动长达四年之久，书中对山东记载尤详。从圆仁在书中所记，可以真实地反映出唐代山东对外交往的全貌，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山东半岛是中、日、朝交往的枢纽地带，是日本早期遣唐使到长安的必经之地。

唐代社会经济繁荣、文化高度发达，吸引了无数海外人士来学习、朝圣、经商。自朝鲜、日本到唐朝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其交通线除陆路自辽东奔赴长安外，主要经由海路沿朝鲜半岛、辽东半岛西行至山东半岛登陆，再西去长安。

唐代著名地理学家贾耽在《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述了唐朝与邻国交通的七条路线，其中海路有两条：一是南方的“通海夷道”，二是“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这后一条路线是“自登州东北海行，经大榭岛（今长山岛）、龟歆岛、未岛（今大小钲岛、乌湖岛（今南城隍岛、北渡岛、湖海渤海湾入口）、而至马石山（今老铁山）以东的都里锁（今旅顺市附近），从此再东航，过青泥浦（今大连附近）、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驼湾、乌骨城南方海面至鸭绿江口，然后乃南傍海经过乌牧岛、贝江口（大洞江口）、椒岛而至新罗国西北部的长口锁，再向南过秦王石桥、府田岛、古寺岛（今江华岛）、得物岛、至唐恩浦口（今仁川以南）。”如沿上述航线继续向东南延续，经过釜山，渡过对马海峡，经过对马、壹歧岛抵日本九州南部，也可穿越濠濑内海，到达博多一带。这一航线在日本早期文献中也有记载。

《日本书纪》称“日本遣唐使来中国登船的港口是难波的三津浦（今大阪市南区三津市町），从三津浦发行的船只沿濠户内海西下到达筑紫后的大津浦靠岸。”大津浦就是今天的博多，唐代时博多设有日本大宰府的外交机构鸿胪馆，遣唐使入唐前要在这里进行一些物质准备，等待出海时机。然后从该处乘船经过壹歧、

对马，通过朝鲜南部的沿海抵达今仁川附近，在这里稍事休息后再直渡黄海或沿朝鲜西海岸北上，经辽东半岛最后在山东半岛的登州或莱州登陆。这就是自登州海行高丽、日本道。唐代日本和朝鲜使节、商人、留学生、僧侣到登州后，多继续西行，自登、莱沿青州、齐州（济南）、曹州（今菏泽一带）进入河南开封、洛阳，最后抵达长安。由于这条中、日、朝交通线的开辟，山东半岛，尤其是登州、莱州在对外交往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它是朝鲜、日本遣唐使节及各界人士前往长安的中转站，也是唐朝和朝鲜、日本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集散地。

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和山东沿海一带有优越的港口可供外来船只停泊和利用，所以唐代出入山东半岛的外国人非常频繁。

《入唐记》对外国人在山东的活动多有描述。如圆仁在登州开元寺佛殿西廊外和堂内壁墙上就看到刻有如下一段话：

画西方净土及补陀落净土，是日本国使之愿。即于壁上书着缘起，皆悉没却，但见“日本国”三字。于佛像左右书着愿主姓名，尽是日本国官位姓名，录事正六位上建必感，录事正六位上羽丰翔，杂事从八位下秦育，杂使从八位下白牛养，诸吏从六位下秦海鱼，从使下六位行散位××度，谦人从七位下建雄贞，谦人从八位下纪朝臣贞，寻问无人说其由来，不知何年朝贡使到此州下。

日本的“位”，是大化革新后的官阶，相当于我国古代的“品”。圆仁所见开元寺所题日本人姓名，当为唐初由登州入境的几次日本遣唐使所留。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考证，自唐太宗贞观四年（630）至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共有七次遣唐使自登莱登陆，（见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但除大使、副使外，其余官员所留姓名极少。据推断上羽丰翔应为第十二次遣唐使中的羽栗翔，他们于唐肃宗乾元二年来中国，正是自登州经过的。

圆仁一行的足迹，也遍及山东半岛。圆仁与弟子惟晓、惟正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初入山东。他们本想去台州天台山求学，但唐政府以交通不便为由没批准他们前往，圆仁一行于是自扬州北上山东，在朝鲜人张保皋所建的法华寺中，他了解到“南向天台道路绝远，又闻中华五台山等诸如佛法之根源，大圣之化处，西天高僧，涉险远施，唐朝名僧，游兹得道”。于是放弃游天台山之原意，改向去五台山求法。他及弟子自文登出发，经牟平、蓬莱、到莱州胶水县，再西向经青州北海、寿光、益都，淄州淄川、章邱、临济、临邑，然后渡黄河北上，经德州禹城、平原、夏津，由夏津折向西北进入河北、山西至五台山。这次圆仁从山东半岛最东部的登州出发，经过八州二十余县，陆行二千二百余里，历时七十天，终于达到了去五台山巡礼求法的目的。时隔不久，唐武宗上台执政，采取了打击佛教的政策，大批寺院被捣毁，僧人勒令还俗，圆仁等外国僧人也限令其还俗归国。于是在会昌五年(845)圆仁一行从长安返回，经河南、江苏再到山东境内，在密州、登州再逗留近二年，待船归国。这是圆仁第二次来山东，经过二州七县。圆仁先后两次往返山东，从最东部的文登，到最西部的夏津，从最南部的泗水，到黄河北的临邑，走遍齐鲁大地。从他亲身经历的记载中，不难看出山东在唐代中国与日本、朝鲜交往中所起的桥梁作用。

(二)《入唐记》对山东境内交通、驿站和对外人的接待均有详细描述。

圆仁在书中谈到了山东陆路交通之发达，在各州县的交通干线上，均设立了用来计算行程的“里隔柱”，“唐朝行五里立一候子，行十里立二候子。筑土堆，四角，上狭下阔，高四尺或五尺、六尺不定，名之为里隔柱。”在山东主要交通线所经城市，还设有供外国客商、使节往来食宿的驿站和客馆。如在文登，圆仁一行住在招贤馆和斜山馆；在牟平，曾住宅阳馆；在青州则停



宿于芙蓉驿。这里驿馆，均是供往来于该地的中外使节和客商使用，食宿极为方便。唐代佛教盛行，日本、新罗使节及各色人物往来于登州、莱州、青州一带较多，许多寺院也担负起接待外国人的任务。如圆仁一到文登，就被县衙门安置在新罗人张保皋开办的青宁乡赤山新罗院居住，日后启程的有关文书均在此办理。到登州后，又被安置在开元寺居住，当时开元寺香火鼎盛“僧房稍多，尽安置客官，无闲房”，以致“有僧人来，无处安置。”

山东登州、莱州做为唐朝与日本、新罗等国交往的必经之地，对外来使节、僧人的接待机构和手续也一应俱全。接待工作均由地方州县政府负责。《入唐记》一书对此多有描述。书中谈到外国人每到一州县，均须持有州县官发给的牒文，方可自由通行。每个州县中，有专门负责接待外人的押衙、通事（翻译）、判官等。外来使节、僧人每到州县，均要换本州县牒文，如不换牒文，则得不到地方政府的食宿供应及有效保护，甚至一些寺院或百姓也不敢留宿。如圆仁第一次进入山东时，因无申请牒文，属私自入境，在密州宿城村借宿，就被村长婉拒。村长告诉他“和尚到此处，自称新罗人，见其言语，非新罗语，亦非大唐语。见到日本国朝贡使船，泊山东候风，恐和尚是客官，从本国船上逃来，是村不敢留客官住，请示以实，示极，莫作妄语，只今此村有州牒。兼押衙使下有三四人在此探候。”并劝他们赶快向地方官申报，取得牒文。圆仁接受此建议，立即将状文呈报县衙，县衙门在接到圆仁一行文书后，立即提供粮食并派判官、通事等陪同圆仁一行到密州。以后自密州到登州、莱州、青州，每到一州衙，圆仁先说明来此事由，然后均要换该州发给的文牒，这样他们无论交通、食宿均能畅通无阻。

各州县衙门对所经过之外国人询问非常仔细，经反复查证无误后，才发通行文件。现将圆仁在县政府与官员往来的几份文件摘录下来，即可对此略见一斑。

圆仁在文登县赤山村法华院住下后，县衙闻讯即“专帖差专人勘事由”，并“限到当日，具分析状上”，并要求圆仁一行报出来此目的和所带行李，负责接待的寺院主持也要出具证明，下面几段是圆仁、寺院之出示的证明及县衙的批复：

日本国僧一人，从小师二人，行者一人，留在山院事由：

僧等为求佛法，涉海远来，虽到唐境，未遂宿愿。辞乡本意，欲巡圣国，寻师学法。缘朝贡使早归，不能相随归国，遂住此山院。已后便拟巡礼名山，访道修行。但随身物铁钵一口、铜饶二具、铜瓶一口、文书二十余卷、遮寒衣物等，更无别物。今蒙县司勘问，具事由如前，牒件状如前。牒谨。

开成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日本国僧圆仁状帖，从僧惟正、僧惟晓、行者丁雄万奉帖。

圆仁所借住的赤山法华院也向县衙门出具如下证明：

青宁乡赤山院状上：勘日本国僧人船上不归事由等状：

日本国僧圆仁、小师惟正、惟晓、行者计四人，口云“远闻重花兴流佛教，故来投学圣教。拟次寻名山迹，巡礼诸方，缘时热，且在山院避热，待凉时即便行。”遂不早县司状惟悉察其僧等缘身衣钵，更无别物。如通状后不仔细，法清等虚妄之国。谨具状上，事由如前。

开成四年七月

县衙在接到圆仁及赤山院主持法清的书信后，才允许圆仁一行在赤山院暂住，并委托新罗押衙所负责圆仁一行接待管理工作。第二年二月，在圆仁一行要求下，文登又发给他们去登州府的公文，全文如下：

登州都督府：

僧圓仁、弟子僧惟正、惟曉、行者丁雄萬并隨身衣鉢等。

牒：檢案內得前件僧狀，去開成四年六月，因隨本國朝貢船到文登縣青寧鄉赤山新羅院寄住，今蒙放任東西。今欲往諸處巡禮，恐所在州縣、關津、口鋪、路次不練行由，伏乞賜公驗為憑，請處分者，依檢前客僧未有准狀給公驗，請處分者。准前狀給公驗為憑者。請牒。

開成五年二月廿三日

文登縣典：王佐；主簿：胡君直。

圓仁一行持文登縣發的公文到登州府後，就得到登州府官員的接見及熱情接待，將他們安置在開元寺居住並提供食物。府衙還發布二個公文，一件是寫給節度使的，由圓仁隨身攜帶，做為政府通行公文，另一件存檔。登州府交由圓仁上承節度使的公文如下：

登州都督府牒上押兩藩使：

據日本國僧圓仁等狀：請公驗，往五台并名山及諸方，巡禮聖迹，尋師學法等。僧圓仁，弟子惟正、惟曉，行者丁雄萬并隨身剃刀、衣鉢等。

牒：檢案內得件僧狀：“本心志慕釋教，修行佛道。遠聞中華五台等諸處，佛法之根源，大聖之化處。西天高僧，涉險遠投，唐國名德，游茲得道。圓仁等旧有欽羨，涉海訪尋，未遂宿愿。去年開成四年元月，留到文登縣青寧鄉赤山新羅院。隔生緣倉溟，忘懷上于海岸。今欲往諸方謁聖迹，尋師學法，恐所在州縣、關津、口鋪及寺舍不練行由，伏望特賜公驗，以為據憑者。”

依檢日本國僧圓仁等，先據文登縣申：“日本國入京朝貢，使却回船到當縣界青寧鄉赤山東海口着岸，至七月二十五日發。”續得縣申：“日本國還船上拋却僧圓仁并行者等

四人。”州司先具事由，申使讫。谨具如前，不审给公验否者。刺史州司无凭便给公验，付妥录申尚书取裁。乃遣僧人自赉状见尚书取处分者，谨具如前。未有申使请处分者。具状上牒者。谨录牒上。

开成五年元月五日

府吏匡从制牒印二

唐代的所谓“尚书押两藩使衙门”，亦称“押新罗渤海两藩使”，是唐代设在山东负责接待渤海、新罗、日本宾客的主管机构。自唐代宗始，该机构主官由当地节度使兼任。如代宗至宪宗时的节度使李正己、李师道父子就以淄青节度使兼任此职。圆仁入唐时，仍是青州节度使兼任此职。在接到圆仁递交的公文验证无误后，即发给由“尚书押名印”的公文，并且“一头给公验，一头奏闻”，再将此事上报朝廷。唐朝政府认可两押藩使发给外人的公文有法律效果，可在国内各地通行无阻。

从以上几件公文中可以看出，尽管唐代后期战乱频仍，藩镇割据加据，中央对地方控制有所削弱，但在山东境内各级政府及负责接待外人的地方官员仍是尽职尽责。在对外交往中，已初步形成一整套严格的制度与方式。这在唐代以前是从未有过的。也说明了唐代中外交往的频繁和山东地区在当时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

（三）唐代新罗人在山东有较大的影响，从新罗人在山东的活动可以看出唐代山东与朝鲜半岛关系极为密切。

唐初，朝鲜半岛上先是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三国鼎立。到唐高宗显庆五年，唐出兵与新罗联合灭了百济。到总章元年（668），唐朝又灭了高句丽，为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奠定了基础。从七世纪后半叶起，唐朝在朝鲜半岛上主要是与新罗发生联系。在整个唐朝，新罗是与之往来最密切的邻国，使节往来多达120次以上。两国交往的内容也特别丰富，包括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和文化

各个方面。

山东半岛处在唐朝与新罗交往的桥头堡位置，新罗人活动的足迹处处可见，比比皆是。由于居住在山东半岛上的新罗人甚多，已形成了由新罗人群聚的“新罗坊、新罗院”，圆仁所到之处，就有文登赤山的新罗院，登州的新罗馆，青州的新罗院，直到齐州境内的长山县（今属章丘）仍有新罗院。为了方便对新罗人的管理，在登莱一些县，还设有专门管理新罗人户的勾当新罗押衙所，其负责人称为“勾当新罗使”。

在登州、莱州、青州活动的新罗人中，以经商者为多。他们往来于新罗、渤海国和唐朝各地之间，进行各种商业往来。

圆仁一行自扬州登陆到山东，再经山东回日本，沿途所乘船只几乎全是新罗商船。就当时的海上交通条件来看，山东沿海与新罗之间的交往极为便利。如圆仁在书中提到：“登州牟平县唐阳陶村之南边，去县六十里，去州三百里。从此东有新罗国，得好风，两三日得到。”又有：“从赤山浦渡海，出赤山莫瑯江口，向正东行一日一夜，至三日平明，向东望见新罗国西面之山。风变正北，侧帆向东南行一日一夜，至四日晓，向东见山岛段段而接连。问梢公等，乃云：是新罗国西州西界。”因为交通的便利，新罗商人在山东沿海一带十分活跃，圆仁等人自楚州向登州行进途中，曾雇佣新罗人熟悉海路者，一次就雇到六十余人，分派于日本九条遣唐使船上。圆仁自楚州到密州路上曾遇一商船，船上人称：“吾等从密州来，船里载炭向楚州去，本是新罗人，人数十有余。”圆仁一行到乳山县后“曾有三十余新罗人骑马或乘驴前来迎接。”自登州至楚州、密州的交通贸易中也有许多新罗人在承担着。圆仁在归国前夕，无法在登州寻找到日本的船，就将“十七匹布雇新罗人郑客东，载衣物傍海往密州界去”。到密州后，他们又在诸城县界大朱山驻马浦“遇新罗人陈忠船，载炭欲往楚州，商量船脚价绢五匹定下”，然后乘船南下。



除了经济交往外，唐朝与新罗的文化交流在山东也有充分反映。唐朝的大批书籍是自此装船运往新罗，许多新罗留学生也自此地浮海入唐朝国子监读书学习，后在唐朝考中进士的就多达五十八人。在新罗的选官制度中，甚至用读过多少儒家书籍作为取仕晋升标准。在《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中有：“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者，起擢用之。”

圆仁在山东遇到的淄州长史金云卿就是新罗留学生，后通过科举考中进士。会昌元年（841）被授与淄州长史，并充当过新罗宣慰副使，代表唐朝访问新罗。《全唐诗》卷三八五收录张籍《送金云卿副使归新罗》一诗，热情地赞颂了金云卿任唐朝政府使节荣归故里的光彩。

唐代在山东的新罗人在沟通中日两国人士的交往中，也起了帮助作用。在许多地方衙门及日本遣唐使船中，均设有新罗译语（翻译）。圆仁在山东曾与他们多有接触。如道玄、刘慎言等新罗人，均受唐政府委托，负责接待来此的新罗与日本人。他们通晓汉语、新罗语及日语，除任翻译外，还为到中国后人地生疏的日本人出谋划策，甚至干些超越法律所允许的事。圆仁一行就曾得到他们的帮助。如开成四年四月，圆仁通过新罗译语道玄与当地新罗人商议，采取办法打通地方政府关节，获得在中国留住权。经常往返于楚州至密州的新罗译语刘慎言，也多次帮助圆仁寻船购物，并协助其返国。

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盛行，并相继传到朝鲜半岛与日本。日本和新罗僧人到中国学习求经者络绎不绝，山东半岛也是新罗僧人活动频繁的地方。《入唐记》一书多处提到新罗僧人在山东的活动情况。如圆仁等人入唐后脱离日本使船，私自留下，害怕

官府查稽，就曾冒充新罗僧人，化名庆元、惠谥、教惠等，以求得新罗人关照。到赤山镇后，他们住在新罗人所建的法华寺，对当地新罗僧人的活动更是多有描写。法华寺是新罗官员张保皋所建，并获得唐朝政府赐与的庄田，每年可收米五百石做为寺院的开支。该寺汇聚了许多新罗僧人，他们在此“冬诵法华经，夏讲八卷舍光明经，长年讲之。”法华经传讲仪式于每年十一月进行，开成四年的十一月，圆仁一行亲临了该寺院新罗僧人的讲经仪式。他写道：

十六日，山院起首讲法花经，限来年正月十五日为期，十方众僧及有缘施主皆来会见，就中圣琳和尚是讲经法主，更有议论二人：僧顿证、黄常寂。男女道俗同集院里，白日听讲，夜头礼忏听经及次第，僧等其数三十来人也。其讲经礼忏，皆据新罗风俗。但黄昏、宣朝二时礼忏，且依唐风，自余并依新罗语音。其集会道俗老少尊卑，尽是新罗人。

新罗人在山东的寺院，与国内名山大寺也多有来往，如圆仁最终决定去五台山求法巡礼是在法华寺听从了新罗僧人圣林法师的劝告。圣林法师交游极广，曾“入五台及长安游行，得二十年来此山院”，该寺另一位高僧信惠还曾去过日本六年。每年自新罗往返登州的僧人成百上千，有些僧人甚至远到印度及东南亚。这个时期中、日和新罗僧人为佛教文化在本国的发扬光大都做出了贡献。

新罗人兴建的赤山法华寺，不仅是传播佛教的场所，同时也是当地新罗居民逢年过节举行各种仪式和庆祝活动的重要场所。开成四年的八月十五日恰逢中秋节，圆仁在寺中亲眼目睹了新罗人集体过节情形。这天寺中设薄饼食等各种饮食，附近的新罗人均来此聚会，“歌舞管弦以昼续夜”，连续三天。在每年十二月法华寺山会结束后，附近的新罗人也在此集会，“集合男女，昨日二百五十人，今日二百来人，结愿以后，与集会众授菩萨戒，

斋后，皆散去”。接待往返该地的新罗僧人，更是寺院的日常工作之一，寺院在某种程度上也承担着宾馆的职能。

在唐代居住在中国的新罗人中，值得一提的一个著名人物是张保皋。张保皋，新罗名马福，是唐代后期活跃于中、日、新罗沿海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既有唐朝的军籍，后又得到新罗政府的支持，被委以重任。他及其下属长期盘据在沿海莞岛一带，不仅人数众多，而且还有为数不少的船队，往来于中、日、新罗之间从事贸易活动。著名的赤山法华寺，就是他出资所建。对张保皋的事迹，《新唐书·东夷传》有如下记载：

张保皋……善斗战，工用枪……自其国来为宁武军小将。后保皋归新罗，谒其王曰：“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愿得镇清海，使贼不得掠人西去。清海，海路之要也。王与保皋以万人守之，自太和后，海上无鬻新罗人者……卒闻大臣杀其王，国乱无主，保皋分五千人与年（郑年）……至其国，诛反者，立王以极，王遂召保皋为相。

张保皋既在唐朝军队中干过军官，熟悉唐国情，与唐朝官员多有交情，又获得新罗国王信任。因而能在新罗至山东、江苏沿海纵横骋驰，大展抱负。他在黄海，渤海打击和镇压贩卖奴隶的海盗，维护了海上的安全，是干了一件有利于唐朝和新罗的好事，自然得到唐朝政府的支持和信任，因此得以顺利地从事国际贸易并在唐朝出资建立寺院。他平定国内叛乱，更是有大功于新罗王朝，出将入相，实属应得。

圆仁到山东，居住法华寺之时，张保皋仍在山东境内活动。也许他当时不在文登赤山一带，但圆仁在其书中记下了开成四年元月二十八日，“夜头，张保皋遣大唐卖物使崔兵马司来慰问。”圆仁和张保皋这两位唐代在山东沿海活动的著名外国历史人物虽近在咫尺，却失之交臂，没有能够在登州晤面，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四）唐代山东人民给来此的外国友人予以热情帮助，表达了中国人民在对外交往中崇尚礼仪、热情好客、助人为乐的友好情谊。

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除详细记载了在中国的日常活动外，还多处谈到自己在山东境内曾受到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热情接待，笔墨间洋溢着发自内心的感激心情。

圆仁一行到达山东之时，唐朝已处在安史之乱以后的衰弱时期，开元盛世那种生机勃勃的景象早已不复存在。特别是唐后期藩镇割据，各地小规模战乱频生，给地方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唐政府平定了淮西之乱后，各地藩镇名义上相继归顺中央，唐朝恢复了表面上的统一，但各地军阀仍大权在握，勾心斗角，国家仍处在动荡之中。唐文宗开成四年，圆仁一行踏上山东土地后就发现各地均是一片残破景象，他在书中做了如实描述：

莱州界内，人心忿刚，百姓饥贫……。

自登州文登县至此青州，三四年蝗虫灾起，吃却五谷，官私饥穷，登州县专吃橡子饭……无粮可吃。

临邑县……城廓颓夷，无一官舍。

尽管当时山东境内经济残破、遍地饥荒，但圆仁所接触到的大多数山东人，无论是官、商、农及僧人，每当得知圆仁一行是不远万里来山东的日本求法僧人，都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如在乳山县境内，当圆仁一行所乘的船遇风浪、缆断无法行走之时，当地的官员王教言等将酒鱼、食饼及绵绸等送上，以解燃眉之急。到赤山村后，赤山院的僧人热情邀其留此居住，青州兵马使吴子练、崔副使、王判官等三十余人，同来寺里相看。在文登县，当县令得知圆仁一行居住在本县惠海寺后，与两位主簿等“数十人入寺来，相看慰问，具说远来留住之本意。”临行时，许多官员亲临送别，一直送出城外。在青州，也得到很好礼遇，

“幕府从初相见之时，差人送路，兼示道路。”该府负责接待的萧判官还多次邀请圆仁一行到私宅吃饭，“汤药茗茶周足，判官解佛法，有道心，爱议论，见远僧，殷勤慰问。”登州军事押衙王长宗还送一头驴，为其驮粮。当圆仁一行经过一些偏僻乡村之时，尽管当地居民生活困难，拿不出什么东西招待远来的日本客人，但多数民户是“心性直好，见客殷勤”，尽其所能提供食宿，“施斋饭饱足”，“主人施粥，又差一人相送指路”，令圆仁等人非常感激。在圆仁笔下，对各地民众的接待多有赞誉，如“到高密县，人心和软”。到即墨县，“管在莱州，人心孝顺，能安存客”，到昌阳县“莱州管，人心好。”

在中国期间，圆仁和唐朝官员张泳的友谊，成为后来中日两国人民交口相传的一段佳话。张泳时任平卢军节度使同军将兼登州诸军事押衙，负责登州对外国人的接待工作。因张泳曾去过日本，对日本国情比较熟悉，也通晓日语，所以唐朝政府将其安排在登州负责接待日人，可谓人尽其才。开成五年，当圆仁一行到文登县时，曾受到张泳热情接待，为其办好通行证并安排食宿。《入唐记》一书也用不少篇幅谈到了他与张泳的友谊。开成五年，当圆仁为求法巡礼私自离开日本使船来到登州后，就得到张泳的热情帮助。张泳深为圆仁一行不畏劳苦，诚心求法的精神所感动，不仅悉心安排圆仁一行吃住，而且积极帮助他们向登州府求索文牒，使圆仁终得唐政府允许去五台山巡礼。临行之时，张泳还专门派人护送出登州，可谓优礼有加。更令圆仁难以忘怀的是当圆仁回程之时张泳对他的帮助。当时唐武宗下令全国灭佛，“不论老小，尽勒还俗，递归本贯，充入色役”，佛教受到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在首都长安，“城中僧尼还俗已尽……诸寺见下手拆毁”。在佛教兴盛的扬州，圆仁也亲眼看到“城里僧尼尽裹头，递归本贯，寺中钱物、庄园、钟等，官家收检……铜佛铁佛尽毁碎，称量斤两，委盐铁司收管。”山东也受到严重影响，如



登州“虽是边北，倏流僧尼、毁拆寺舍、禁经毁像、收检寺物，与京城无异。”在唐朝政府的禁令之下，许多僧尼流离失所，处境悲惨。在山东，圆仁目睹“唐国僧尼本来贫，天下僧尼尽令还俗，乍作俗形，无衣可着，无物可吃，艰穷至甚，冻饿不彻，便入乡村，劫夺人物，触处甚多，州县捉获者，皆是还俗僧。因此，更倏流还俗僧尼，勘责更甚。”这样一种局面，对作为外国僧侣圆仁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是很大的。在长安，他与许多日本、新罗僧一样“因无唐国祠部牒，被配入还俗僧”，并被勒令立即还俗归国，尽管他是外国僧侣，也接到了“如有僧尼不伏还俗者，科违勒罪，当时决毁者”的严格命令。迫使圆仁一行不得不提前结束在长安求法活动，脱下袈纱还俗归国。在这样一种恶劣的政治气氛中，圆仁归国路上的困难可想而知。在扬州、楚州、涟水、海州等地，地方官得知圆仁是外国僧人，因怕受牵连，均不愿加以接待。迫于无奈，圆仁于会昌五年不得不重返登州以便寻船归国。在文登又与张泳相见，对再次见面时二人喜悦心情，圆仁不惜笔墨，跃然纸上：

到宅相见，便识欢喜，有问殷勤。（张泳）喜相云：

“前从此发去以后，至今不得消息。心里谓早归本国，不谓更到此间，再得相见，大奇、大奇！弟子与和尚大有因缘。余管内若无异事，请安心歇息，不用忧烦。未归国之间，每日斋粮，余情愿自供，但饱餐即睡”……。

因原驻地赤山寺院已被拆毁，张泳就选择一处较为僻静的房舍供圆仁等居住，免受其外界排佛干扰。“客中事一切委令勾当，自发心供每日菜蔬周足。大使频有书状，送粮食安存殷勤。”每隔几天，张泳就来亲自或派人来照看安慰圆仁。他还打通州衙关节，得到州牒，允许圆仁等“且委安存，遇有过往日本船，即任意东西。”由于张泳的悉心关照，从会昌五年八月至大中二年五月（845—847），圆仁得以在文登县内平静地度过了近两年时

间。这期间，虽然排佛之风在全国越刮越烈，但圆仁能够不受外界干扰，安心在此读书，并整理和研究自长安携带来的大量佛教经籍，为他日后事业大成奠定了基础。

为了能让圆仁早日返归故里，张泳多次派人为他寻找往返日本的船只。在一时无法找到去日本船只的情况下，张泳甚至不怕担风险违制为圆仁建造返国之船。只因动身前夕，张泳的努力为谗言所累，而未能如愿。此事圆仁在书中也有一段记录：

张大使从去冬造船，至今年二月功毕。专拟载圆仁等发送归国。闰三月十日，间入新罗告哀，兼予祭册立等副使、试太子通事舍人，赐绯鱼袋金简中、判官王朴等，到当州牟平县南界乳山浦，上船过海。有人谗妄张同军将：“遣国章，拟发送远国人，贪造舟，不来迎接天使”云云。副使等受其谗言，深怪牒举国制不许差船送客过海等，张大使不敢专拒，仍从文登县过海之事不成矣。

这年三月，圆仁得知楚州有船欲去日本时，便南下寻船。张泳亲自送出二十里外。六月，楚州之船载圆仁又回到登州，再从赤山浦渡海东去日本。张泳又亲临船上话别，“得张大使送路信物，数在别”。两人感情甚笃，分手时仍念念不舍，真诚地反映出山东人民对日本友人的深情厚意。

圆仁在长达九年多的中国求法巡礼之行中，虽历经坎坷，但他精心求学，对佛教的精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中国的国情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对他日后事业大成，闻名日本佛教界应该是起到了很大帮助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中国之行，结识了许多朋友，增进了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特别是圆仁两次来到山东，生活在这里达四年之久，亲身感受到山东人民对他的关心和帮助，令他十分感动并难以忘怀。当圆仁归国前夕，许多友人相送话别。中国僧人栖白还当场赋诗一首：

家山临晚日，海路信归桡。

树灭深无岸，风声只有潮。  
岁穷程未尽，天未国仍遥。  
已入闽王楚，香花境外邀。

诗文正是中日两国人民脉脉情深的写照。亦正如诗中所言，圆仁后来成为日本佛教天台宗的集大成者，佛教史上卓越的人物之一，可谓是“香花境外邀”了。他的代表作《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更是中日关系史上不可多得的不朽名著。

作者工作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本文责任编辑：曹月堂）

---

## 关于《发微论》的作者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术数类著录《发微论》一卷，署“宋蔡元定撰”。馆臣所撰提要曰：《地理大全》亦载此书，题曰蔡牧堂撰。考元定父发，自号牧堂老人，则其书当出自发手，或后人误属之元定，亦未可知。然勘核诸本，题元定撰者为多，今故仍以元定之名著于录焉。”今案明万历年间建阳蔡氏之嗣孙蔡有鹄辑刻蔡氏九儒之著作为《蔡氏九儒书》，其中《牧堂公集》收录了《地理发微》，与四库全书中的《发微论》为同一书。《牧堂公集》附录宋詹体仁《蔡牧堂公墓表》，称蔡发著《地理发微》、《天文星象》诸书行世；又朱熹《跋蔡神与（案：蔡发字神与）绝笔》（作于绍熙三年，1192年）称蔡发“于《易》象、天文、地理三式之说无所不通，而皆能订其得失”；张咸《地理发微序》（作于乾道二年，1166年）称蔡发“通天文、地理之术，精阴阳星历之数，故作《地理发微》一书，雄文大义驰骋古今”。固此《发微论》（即《地理发微》）为蔡发所作，当无疑问。

• 杨世文 •